

銅仁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銅仁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铜仁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一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铜仁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委员：黎亦飞

副主任委员：邵冠群 黄义厚

刘应铭 徐嗣侨

文史资料办公室主任：陈俊杰

《铜仁文史资料选辑》编辑组

主 编：邵冠群

编 辑：曾南乔 石作祥

傅顺章 陈俊杰

封面设计：巫子强

书名题字：冯济泉

封面篆刻：李华洲

前 言

《铜仁文史资料选辑》，是根据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九年四月，对各方面人士提出的“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的号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本着存真求实的方针向各方面人士组稿起步。历经十年动乱，原稿遗失，未能成书。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共铜仁县委和县政协的领导下，响应胡耀邦同志“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建设两个文明的号召下，本会振奋精神，组织离休退休老干部、老同志、老教师，老中医等各方面人士，先后组成专门班子，清回遗失稿件，征集重要史料，内查外调，反复核实，慎重整理审定，第一辑始向各界人士见面。

本辑刊出了烈士业迹，周、李、车、王之战，灾荒见闻、派系斗争、铜仁建制考证、铜仁风物等二十四篇，凡十余万言，为编写铜仁地方志保存和积累资料。

本辑刊载了八十五高龄的李侠公同志在病中以《缅怀革命先烈，激励后人》为题，回忆革命前驱周逸群烈士与李老在东京留学、黄埔军校共事八年的事迹，史料极其珍贵，特志谢忱。

本辑能以问世、荷蒙贵州省档案馆、贵州省博物馆、铜仁地区文化局、中共铜仁县委党史办以及有关单位和各方面人士的赞助。一并致谢！

本辑限在内部发行。由于我们政治思想水平不高，调查研究不够，编辑整理粗疏，错误、缺点、遗漏在所难免，恳请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铜仁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二日

目 录

缅怀先烈 激励后人

回忆周逸群烈士·····	李侠公	1
周逸群烈士遗诗三首·····	省博物馆供稿	14
过铜仁悼周逸群烈士诗十二首·····	贺锦章遗稿	18
马元熊烈士生平简介·····	铜仁县政协 文史办	21
我对贺龙将军两次来铜仁 和出师北伐的回忆·····	刘应铭	28
贺龙同志在革命早期两次率部 来铜仁的实况·····	铜仁地区文化局稿	32
铜仁历代建制沿革考·····	曾南乔	37
解放前铜仁专署沿革和历任 专员简介·····	铜仁县政协 文史办	45
从民国至解放前夕, 铜仁历任知府、 知事、县长一览表·····	铜仁县政协 文史办	47
1928年10月——1929年7月 贵州军阀周、李之战·····	胡刚等稿 林子贤	53
周(西成)、李(晓炎)铜仁之战·····	万世炯	78

在周西成、李晓炎战争中	
遗祸铜仁的实况·····	铜仁县政协 文史办 98
我参与王家烈、车鸣翼战争的经过·····	万式炯 102
铜仁姜家坡惨案纪实·····	刘应铭 107
记清末民初铜仁当铺	
“仁兴恒发记”的兴衰·····	张治安遗稿 110
铜仁地方票币发行始末·····	余宝谦等 116
旧社会鸦片盛销时期的铜仁市场·····	朱耀先遗稿 125
铜仁商会简介·····	余宝谦 129
我所知的铜仁厘金税捐·····	刘洪均 138
庚申、辛酉年铜仁灾荒见闻录·····	铜仁县政协 文史办 143
国民党铜仁“新”“老”派的形成	
及其相互斗争的经过·····	杨千民遗稿 148
我在铜仁主持竞选	
“国大代表”的经过·····	杨千民遗稿 163
铜仁九龙洞地质概况·····	铜仁地区水电设计工程队 179
铜仁风物简介·····	马季群 187

缅怀先烈 激励后人

——省政协副主席李侠同志对周逸群

烈士回忆的谈话

周逸群同志是铜仁县人，一八九八年出生，比我大一岁。说是一八九六年生，不是事实。

我们是一九一九年在日本东京留学时认识的。回国后同在上海、黄埔军校和广州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达八年之久。大体可分三个时期。即：东京留学时期，在上海办《贵州青年》时期，黄埔军校和广州工作时期。虽然事隔六十余载，回忆起来，有许多较大的事件，还能记忆犹新。特别是逸群烈士的卓越才能和对党无限忠诚的献身精神，给予我的印象是极深的。现在我接受你们的要求，谈谈烈士的业绩，也许能起一点表彰先烈、激励后人的作用吧。现分几个时期谈谈。

日本东京留学时期

我是一九一九年元月出国的，记得是阴历腊月，到日本不久就过春节。逸群也是同一时期出国的。到东京后，我上明治大学，他进应庆大学，攻读经济科，学制是五年。但逸群同志不顾只差两年就要毕业的学历，看到祖国处于危亡之

际，不愿再读下去了，毅然邀我一道回国，寻求救国真理，献身革命事业。

逸群同志的留学生活，不是读死书的，表现在他课堂上做笔记，总是大纲式的记录，而不作囫圇吞枣的笔记。他特别着重于中外近、现代史的钻研。

当时，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影响到留日学生生活的艰难，特别是川、滇、黔边沿省份更苦于汇兑阻滞的窘境，当时北洋政府驻日公使胡维德还趁机揩掬中饱，以致无论自费生或公费生经济都接应不上，造成生活上的极度困难，得不到学习的安定环境。于是，三省学生集会讨论。逸群平素寡言鲜语，但在关键时刻，却侃侃而谈，独排众议，指出问题的中心是大小军阀忙于争夺地盘的混战，不顾学生死活所造成的。他主张留学生团结起来，组织力量就近向驻日公使馆理论，同时要取得留日学生总会的声援。他还建议立即行动，将三省学生组成三个小组，每组推举代表三人，再由代表推举一人为总代表。结果，他被选为总代表。第二天，逸群率同代表们到公使馆找公使解决学生生活费问题。胡维德开始避而不见，几经交涉，终于迫使公使胡维德出面接见，这个北洋军阀系的官僚，最初想要油滑手腕应付下去，由于逸群同志为首的代表据理质询，加之有逸群同志预先安排在神田区中国青年会的广大学生群众为后援的声势，胡维德不得不同意发钱，解决学生这一个时期的学费困难。通过这次小小的斗争，使我认识到逸群同志的组织才能和坚定的毅力，我们从此结为亲密的战友。与此同时，逸群还进行反对北洋军阀接受华盛顿九国公约的学生集会的斗争。大家知道，九国公约是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留日学生集会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

径，发起留日学生回国请愿活动，逸群同志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分子，并被选为留日学生回国代表之一，参加了回国请愿运动。

逸群家境比较富裕，但在东京时生活俭朴，总是身穿学生服，不象某些留日学生洋装革履，我悉知他的生活习性是自奉菲薄，朴实无华。当他得知同学和朋友有急难时，却毫不吝啬，乐于解囊相助，遇到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向他还钱，多是婉言拒绝接受。我由衷地敬佩逸群同志的高尚品德。

一九二二年暑假中，逸群回家乡铜仁并到了贵阳，返回东京后，曾向我诉说贵州见闻，他那种忧郁激愤的情绪，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他这样说：贵州省简直成了一个鬼世界，清晨上街，所见是一片阴沉沉的死寂，店铺紧闭，行人稀少。但一到夜间，则又喧嚣得令人头晕目眩，一些酒席馆生意兴隆，欢笑猜拳的噪音震耳欲聋。路旁充塞小饮食摊，这是他们分润一点油水的好时刻。僻街小巷，时见弃婴，无人收尸的路毙横陈街头，而不以为怪。原来那时贵州的统治者袁祖铭，是北洋军阀的走卒，比起他前辈的一些军阀来，其剥削压榨老百姓的手段，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更肆无忌惮地强迫农民扩种鸦片烟，作为他个人扩充军队和饱私囊的一大财源。这就造成白昼阴森，午夜“繁华”的鬼世界。吸食鸦片，公然成为士大夫阶层社会的应酬品，官场的头目们在黄昏后躺在烟榻上商讨他们的一省“大事”。记得逸群用了两句话作这次谈话的结语说：“贵州如此，全国不都是一样吗！”

逸群同志此次回国，在上海逗留时间较久，曾带来很多书刊杂志，并花了很多钱订购当时上海的各大报纸，约定按

日寄出。从此，他在东京的读书生活，阅读国内的报章杂志，就占了他的一部份时间。他受到《向导》、《中国青年》的启发教育钻研马克思了。当时日本书店发行的进步书刊不少，各大学的一些教授也趋赶时髦大讲马克思，逸群同志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了。

一九二三年春天，正当日本樱花盛开时节，我清晰地回忆到逸群同我一次谈话的情况，他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说：

“我决定回国了，家乡如此，国家如此，过着这样读死书的留学生活，实在耐不下去了。”紧接着问我：“你呢？”我蓦地听了这话，一时答不上来。他又紧接着说：“你们学校学制比我们短一年，现在已是到你到毕业的时候了，怎样？等你毕业后，我们一起回国吧！”我当时曾联想到他平时表示，志愿是当一名新闻记者，有宣传民众引导革命的抱负。就问：“当新闻记者的事有门路了吗？”他说：“回国去闯！”这样，我们就在一九二三年十月间一同回国了。

上海办《贵州青年》时期

一九二三年十月我们一起回了上海。那时的留学生毕业回国后，有些是去走当官的门路，有些是找大学当教授，逸群则决定作新闻记者，并以此意见征询于我，我同意跟他走同一道路。然而上海滩上，十里洋场，以我俩这样没有“大人先生”引进的学生仔，能凭白进入报馆当记者吗？结果我们投入社会生活的第一步设想就幻灭了。逸群淡然地对待这次失望，而以坚决的口气说：“我们自己来办吧！”我诧异地问：“有力量办吗？”他说：“办不起大报，办个以贵州为

对象的小报吧。贵州是一国的缩影，谈贵州，就很自然地谈到全中国嘛。”他接着又说：“我们应面对青年，就取名《贵州青年》吧。”原来逸群同志对一件事的考虑总是在脑子里盘算较成熟后才讲出来。他已考虑到办报的经费，说可以从家里搞一笔款子来。逸群父母早逝，家有遗产，到了这年的冬天，他的伯父支持他办报的志愿，并即筹措汇来五百元大洋，作为创办《贵州青年》的经费。于是，我们就在上海法租界哈同路民厚南里分租到一间前楼的房间居住，我们就这样办起了《贵州青年》。

《贵州青年》从编排到发行多是逸群同志负主要责任。同我们办这个刊物的有北京朝阳大学的胡秉铎同志，在上海复旦大学的鲁纯仁，还有日本帝大的张伯符，特别是秉铎同志是全力支持的，他用“赤光”的笔名写了很多文章。逸群同志更针对当时统治贵州的北洋军阀走卒袁祖铭，作为揭发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压榨中国人民的一个地方的缩影。他用“黔铁”的笔名发表了《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一文，指出当时的贵州应当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抵制北洋军阀走卒袁祖铭回黔。在第六期一篇题为《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的文章中，着重揭露和分析西南军阀投靠北洋军阀的罪行，指出刘湘、赵恒惕是精神附北派，刘存厚和袁祖铭是实质附北派，明确指出“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性质虽异，而同为附北。我们站在民主主义旗帜下，自然应该一律加以攻击。”这些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在上海主办的《中国青年》领导人恽代英、邓中夏、肖楚女几位同志的注意，肖楚女同志还特写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第三十六期（一九二四年六月）赞助我们。特别对逸群同志指

名统治贵州的北洋军阀袁祖铭的罪恶事实给予赞赏，认为是从地方看到全局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黔铁君对于一般抱狭隘嫉滇主义的贵州人，予以纠正，说：‘贵州人此时，切不可因为恨唐继尧的滇军而走错路——去欢迎直系势力的袁祖铭回黔驱滇，因为贵州实在应屹立西南始终和北洋军阀对抗为着民国奋斗的。……今天的西南尚在继续护法事业并联合努力革命的期程中，贵州既和西南各省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故贵州今日是不可能让任何反动势力侵入，将它原有的个性摧残，使它的地位和精神以此与它的环境永陷于矛盾和冲突的悲境的。’这是一个何等周到的政治见解，何等远虑的革命态度！”楚女同志还亲自到“贵州青年社”访问我们，更增加我们努力办好这个刊物的信心。从此，得到了这些党员同志的教导，引导我们对反帝反封建的认识提高得多了。当时的国民党左派报纸《国民日报》在副刊《觉悟》专栏，也为我们发表《贵州青年》的目录，替我们作广告宣传。这些都是对我们的有力支持、鼓励和鞭策。而逸群同志也就是在这些党的同志的辅导下，撰写了许多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立场的文章，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贵州青年》激励着贵州青年前进，当然也就激怒了贵州军阀统治者的仇视，他们曾写信给“贵州青年社”，极尽污蔑辱骂的能事，还画了一枝手枪作枪击青年社的姿势，还用了“贵州省黔军总指挥部”的大封筒官衔信封寄来。这就造成《贵州青年》成为当时贵州的禁书之一，以致此刊物寄到后多被没收销毁，但我们还是用了很多隐蔽方法把刊物寄回贵州。

黄埔军校时期

原来我们去黄埔军校，是应何应钦的邀约，何读到逸群同志和我发表的许多文章，引起他的注意。何是贵州人，当时任黄埔军校的军事总教官，他写信约我们去黄埔军校工作。逸群同志复函说：“我可以到黄埔来，但不是做官，而是来当兵。”逸群同志在当时对拿起武器闹革命的重要性已有初步认识，这表现在他临离沪时给我的一首诗（我已先去黄埔），诗这样写的：

废书学剑走羊城，只为黎元苦匪兵；

战伐相争廿四史，岂无白刃可亡秦！

写给我的这首诗，是在我已到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任特别官佐秘书职后，逸群是在一九二四年十月间到黄埔的，他走得比我晚些时，是因为他丢不下《贵州青年》的编辑工作。他到黄埔进了第二期的辎重队，真的当上兵了。在他进校后极繁重的军事学习中，还是挤出时间参与移在广州出版的《贵州青年》的工作。他一生的习性，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地顽强工作的。

逸群同志到广州，携有恽代英同志介绍他去会见中共两广区委组织部部长穆青同志的信。他一到黄埔就告知我：他已决心做一名共产党员。肖楚女、恽代英都支持他，他见到穆青后，穆青同志也表示同意。因此，他到校不久，就经军校特别党部负责人鲁易、吴明两同志的介绍，加入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鲁易同志这位优秀党员，不幸在洪湖特区工作时，被忠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夏曦杀害了。有些人传说逸

群是在上海入党的，不是事实。入党后，在两广区委和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对党对人民作出巨大贡献。

那时的黄埔军校，是在苏联积极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党中央派周恩来、聂荣臻、鲁易等同志建立政治部和国民党特别党部，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派了许多党团员到校学习，形成坚强的革命骨干。逸群同志入党后接受恩来同志面示：对外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出面，不宜透露共产党员身份。逸群首先参加了刚建立的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党的外围组织“火星社”，这一组织是用列宁创办《火星报》的意义来取名的。逸群入校前，是由一期的党员学生蒋先云、李劳工、黄锦辉等同志领导工作；入校以后，他成了社里的积极活动份子。先云同志曾告诉我：逸群同志精力超人，他在刚入校训练那样繁忙的时间里，为要了解一些新社员的情况，总是逐个地深入接触，并如期把了解到社员情况列表详细汇报。这就为尔后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打下了基础。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建立，是周恩来同志在出席一次两广区委会议时，建议有成立这一组织的必要。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表示赞助，认为通过这个外围组织，可以团结一些革命军人在党的周围发挥军人在大革命时期的作用。原来“青军会”组织成立于一九二五年年年初，限于黄埔军校以内，周恩来同志指定逸群为主要负责人，以第一期学生蒋先云、左权、陈赓等同志协助之，教官和队部军官中有金伟庄、茅延桢、徐坚等同志。稍后，就发展到驻粤的滇军干校教导团、湘军讲武堂、粤军宪兵营、鄂军讲武堂及部份的海

军中，九月间会员已达到二万多人之众。这时，恰好逸群已届满一年的学习时间毕业了，恩来同志决定留他在军校政治部专做主持“青军会”的工作，逸群同志放弃他个人要直接带兵的意愿，服从组织决定，此后，做了较长时期军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记得逸群曾对我转述了恩来同志对他提出这样的意见：“你现在去带兵，不过是带一连，至多一个营的部队吧，而你作‘青军会’工作，则是两万人的工作。而影响还不只此。”这样，他遵照党的决定，放弃了个人的意愿。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逸群亲自制定了《青军会简章》，被选为主席。创办了《青年军人》、《中国军人》两个刊物。他在这两个刊物上写了很多文章，这一时期的文章，他已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的实质，是一个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了。他在《青年军人》第五期发表《论牺牲》一文，是针对当时黄埔同学在东征时讨伐陈炯明战争中，如何正确对待牺牲精神而写的。在《中国军人》第七期上，他以《外祸与内忧》为题写道：“中国现实之民族运动，以‘五卅’事件而充分证明劳动者之特殊势力，其不妥协精神，实远在各阶级之上。……中国民族革命之成功，必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惟有中国劳动阶级，有此决心，有此力量。”他已明确提出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指出劳动者（工人阶级）的不妥协精神远在各阶级之上。这已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中心问题揭示出来了。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国民党大右派戴季陶策划成立的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实质是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斗争是很尖锐剧烈的。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当时是伪装左派面目出现，实质上是和戴季陶一体的。戴季陶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曾撰写一本小册子题名为《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反对阶级斗争，宣扬孔孟之道的仁爱道德观。“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就是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当时黄埔军校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反右派斗争，对校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蒋介石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蒋、戴就秘密指使他俩的亲信，搞了一个“孙文主义学会”，标榜正统的孙文主义，扬起反共的黑旗，斗争越演越烈了。出面领导“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是教员中的缪斌（此人后成为汪伪政权的大汉奸，被镇压）以及学生中的贺衷寒，杨引之、邓文仪等人，而幕后的直接指挥者则是王柏龄（当时为教授部主任）。真理在我们手中，斗争形势的发展越对“孙文主义学会”不利，也就是对国民党右派的不利，蒋介石就不得不以“亲爱精诚”的校训为幌子，宣布两会的存在不合校训，一齐解散了。时间是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但两会的斗争并不因名义的取消而结束，斗争是越加剧烈的。表现在即要谈到的“大佛寺枪击事件”。

大佛寺枪击事件

再其次，谈谈“大佛寺枪击事件”：当时两广区委的领导是正确的，他在陈延年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是坚持同国民党右派作顽强斗争的，同时又不放松同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解散后，继续在周恩来同志和两广区委的领导下，作短兵相接的斗争。那时